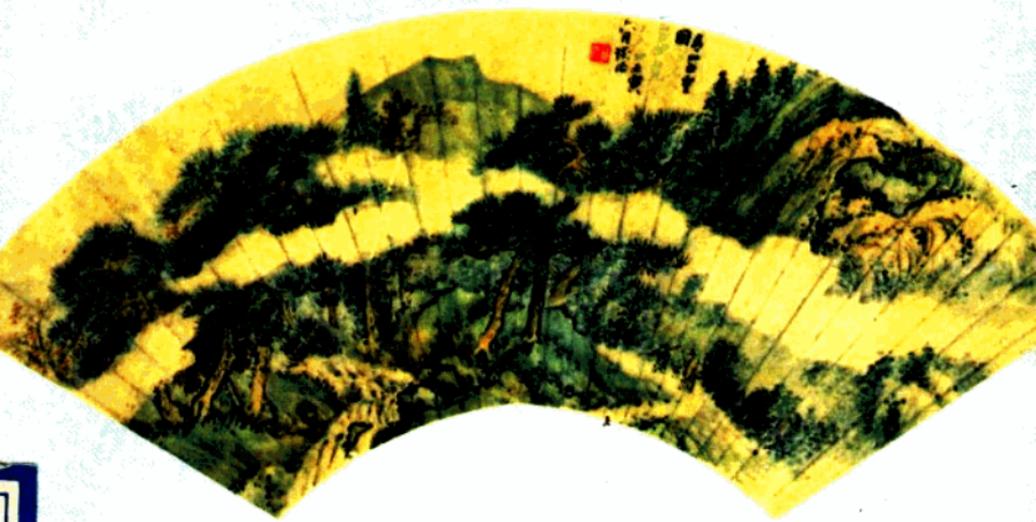


李珍華 著

LI ZHEN HUA ZHU

# 王昌齡研究



太白文藝出版社

## 序

---

傅璇琮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李珍华先生将他十年前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的旧作《王昌龄》译成中文，并附近几年来新作论文三篇，起名为《王昌龄研究》，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曾受李珍华教授的委托，通校了全部译文，并参考国内有关王昌龄研究的成果，对书中某些章节作了少许润饰。值此全稿完成，交付出版之际，我觉得我有义务在书前写一篇短序，向国内读者介绍李珍华教授和他的著作。

李珍华教授在美国几所大学执教多年，他在美国主要是讲授美国史和世界文化史。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唐代文学有着执著的爱好和深厚的修养。他是福建人，抗日战争时曾以一腔的报国热情，投笔从戎。时隔数十年，当他谈起年轻时如何在战火的余隙，还不忘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在煤油灯下，一边放着英文书，一边放着唐诗，一谈起这些，李先生就神采奕奕，兴会淋漓。在60年代，他曾写过一些新诗，发表在台湾及美国的

一些刊物上,也无不深含故国乔木之思。也正因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在80年代,李先生就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唐诗学界,建立了良好的、日益密切的学术联系。

今年是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十周年。1982年春夏,在西安先后召开了对唐代文学研究极有关系的两个会议,一是由霍松林先生主持的,在陕西师大召开的全国唐诗讨论会,二是由西北大学与陕西师大共同发起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应当说,这两个会共同奠定了中国大陆唐代文学研究大发展的基础,而李珍华先生恰恰是参加了在陕西师大举行的唐诗讨论会。在这之后两年,唐代文学学会在甘肃兰州召开的第二届年会,李先生又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赶来,并同与会的大陆同行,坐车穿驰河西走廊,共同欣赏唐代边塞诗描写过的胜地张掖、武威、嘉峪关的奇景雄姿,又与我们一起流连于敦煌、阳关遗址。1986年,他又到洛阳,参加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1987年10月,他应西北大学之邀,参加西大校庆时举办的周秦汉唐学术讨论会,这本书附录中的论王昌龄边塞诗的论文,就是为那次会议准备的。1990年11月,他又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及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可以说,在我们唐代文学学会与海外的交往和联系中,李珍华先生是我们接触最多、了解最深的一位。他与老一辈学者有很深的友谊,而每一次来华参加学术会议,又总是不断认识与结交新的中青年学者,并总是得到他们热情而亲切的接谈。

1982年唐代文学学会成立时,曾提出编印《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我与霍松林先生参与了具体的编辑工作。就在《年鉴》的第一期上,李珍华先生应约写了《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一文,详细介绍并评论了本世纪以来美国学者(包括美籍华裔学者)在唐

诗研究上作出的业绩。这在80年代初确使我们大开眼界,使我们因此而了解大洋彼岸还有一支不可小看的力量和对手。文章最后说:“我认为,国家之间的敦睦邦交,人民之间的增进友谊,学术上的加强交流,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深切地希望这个多层关系能继续得到发展。”李先生这里写的是希望,而他自己却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这美好的向往。如上所说,他不但每隔二三年来华参加会议,而且还请中国的学者前去,在70至80年代,他曾先后邀请叶嘉莹先生、安旗先生和我到密西根州立大学作学术访问,以求促进学术交流和合作。他还不断带美国学生来华,作实地考察,让他们亲身体认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语言环境。他不止一次说过,中国搞古典文学的年轻学者一定要掌握一门外语,并直接到国外进行实际训练(包括听课,到图书馆看书,甚至搞电脑)。现在,他的这些设想更有所扩展。他已与我国高校古籍委员会建立初步合作关系,与高校古委会秘书长安平秋同志商议,在中美一些大学中,互派学者进行定期访问,还拟编著《美国当代中国学学者名录》以及编纂美国主要图书馆藏中国古籍书目。这些计划都是使人神往的,这标志了李珍华先生在促进中美学术交流上以及他自己的治学道路上,又跨越了新的一大步。

我觉得,应当从这个大背景上来看待这本《王昌龄研究》出版的意义。《王昌龄研究》是一本具体的书,而且字数也不过十来万字,但它却是中美两国学者日益发展着的学术合作的一环。它在现时的出版,其意义已超越单纯地对一个具体的古代作家研究的意义。

当然,就是从王昌龄研究本身来说,李珍华先生的论述仍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和启发的。他对王昌龄的研究,起步是较早的。1982年出版《王昌龄》时,国内的有关论著还不多,而他对王

昌龄生平的独立研究，却与国内的学者不谋而合。现在看来，他当初对王氏生平的记述，还稍嫌简略一些，但后来论边塞诗与《生平新探》两文中却有相当丰富的考析了，其中好几点（如王氏西北之行的路线及第二次贬谪的行程），到现在还居于研究的领先地位。我觉得，这本书最精采的，是关于《诗格》的论述以及对宫怨诗的分析。王昌龄的《诗格》，从古代（如清代的《四库提要》）到近现代，大多认为系后人伪托，但李先生却坚持出于王氏之手，他大量地引用了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材料，使人信服。我自己最初也是不大相信《诗格》出于王昌龄之手（见拙著《唐代诗人丛考》中的《王昌龄事迹考辨》一文），李珍华先生曾与我长谈两次，我被他的学术激情与科学理智所折服，于是重新搜集材料，作了通盘考虑，与李先生合作写了《一部有争议的书》文章，这篇文章曾得到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卓有建树的天津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先生的首肯。而在这本书中，也就是说，在十余年前，李先生就结合王昌龄的身世与整个思想，对《诗格》作了具体的、非常深入的探讨，逐条揭示出王昌龄文学思想的不少精辟之处，这在国内现在还是不多见的。另外，关于宫怨诗，书中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深入到诗中主人公的内心体验，细致入微。在论述中还适当运用欧美现代的文艺理论，中西结合，恰到好处，使人在美感享受中又在学术理性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这本书的字数不算多，但在我觉得，它提供了我们如何进一步深化作家研究的思考选择。我想，这可能与李珍华先生多年的世界文化史讲授有一定的关系。他把他所受到的欧美学者关于文化史的有益探索，运用于中国作家的思想研治，因此不期然地获得一种新识。由此，我也更感觉到，李珍华先生近些年来对于中美学术合作的积极促进与努力，确是有其较深层次的思想意

蕴与感情潜流的。

我忝为李珍华先生的学术同道，对于中国的唐诗学虽稍稍知道一些，但对国外的研究，以及世界文化史，却所知甚少，仅涉皮毛。因此上面所说的恐只是瞎子摸象，多有未当，谨就教于李先生与广大读者。

1992年10月，值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10周年之际

## 前 言

---

十年前开始研究王昌龄是我走了一大段路以后的事。那时候，我正在对杜甫的诗入迷。我曾集中编辑他散布在诗集中的有关论诗的篇章，而对他似乎相互矛盾的一些话感到不解，诸如：“老去诗篇浑漫与”和“老去渐与诗律细”，尤其是他的《戏为六绝句》。我当时很想探明他两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涵义。

我当即下决心探讨这个问题。于是我放下对杜甫“夔州诗”的研究，而开始了我研究唐代文艺评论的生涯。当时我发现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过具体的工作，倒是朱自清（1895——1948）先生的一席话启发了我，引导我对三种盛唐人所编的唐诗选的关注。尤其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对于了解盛唐诗歌的递演以及盛唐诗歌的性质和使命，确很有价值。同时，殷璠对“神”、“气”、“情”和“风骨”这类词的使用也较为明确一贯，这样就供我对这些术语作进一步的探讨。

《河岳英灵集》成书于公元753年（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它选集了盛唐（除杜甫以外）的大家诗人。殷璠把王昌龄与曹、谢

并提，并将王氏诗歌当作中兴高作，盛唐代表，这样的评价引起我特别的注意。故当我初步完成《河岳英灵集》的研究后，我即决定开始倾全力研究王昌龄和他的诗歌。一开始我就发现，虽然王氏的七绝，诸如从军和宫怨，被认为千古绝唱，这些诗篇也为众多选本选入，他的生平却不甚为人知，他的艺术观点更无人品赏。甚至，他是否曾经写过《诗格》也被人怀疑，而一些《诗格》残篇也被认为是伪托之作。

由于新旧《唐书》对王昌龄的记载比较简略，而有些方面还有欠正确，我只好设法从他现存的180多首诗和同时诗人如常建、李白、孟浩然等人的篇章中找出线索。这一点说明为什么第一章里包括了很多这类的诗歌。第二章是提供盛唐和盛唐以前的文学流变和诗歌艺术评论背景。我之所以对近体诗的崛起赋以较大篇幅，这是因为我认为声律是盛唐对诗歌本质和它的主体应为何物的症结所在。至于近体诗是如何在漫长的年月里逐步形成，大部分看法是我个人的，但我实际上是得益于如郭绍虞这些前辈学者们的出色成就。为了要强调王昌龄的诗歌理论和艺术观点，本书的第三、第四两章就专题讨论分析他的《诗格》。他的绝句是第五章的主要构成部分。

这本小书的研写经过了一段颇长的时间。我首先要谢谢我的夫人，Lucy，她的耐性和牺牲。她身为肿瘤基因专家，但对我的“雕虫”却倒很支持。至于我的同事和友辈对我的帮助和建议更非我三言两语所能表达。我非常感谢印第安纳大学的罗郁正和柳无忌两教授为我细读我的关于《河岳英灵集》研究稿的全部，并就唐诗提供很多极有价值的看法。我非常感谢英国剑桥大学的大维·麦克姆伦(David McMullen)教授，他在我于该校作为期一年的休假期间给我提供了甚多有关唐诗艺术评论的商

讨机会。我也非常感谢剑桥大学皮肯(L、E、R、picken)教授给我提供有关唐诗和唐代音乐的资料和看法。我还感谢于日本京都大学的平冈武夫教授为我安排,使我能于1971年在该校潜研了一个夏天,所获甚多。我尤其感谢美国吐温世界文学名人中国部门主编,阿里卓那大学的威廉姆·斯库尔兹(William Schulz)教授的耐心和细心。在研写这本书的十几年中我曾受到美国和世界各地大学的热心帮助。这本书的研究金是来自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全校学术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特款。

李珍华于密州大学  
1979年

# 目 录

---

序 (傅璇琮)

前言

- 第一章 王昌龄生平初探…………… ( 1)  
第二章 诗歌与背景——文艺思想与艺术评论…………… ( 20)  
第三章 诗的格调——意、境、味、声…………… ( 36)  
第四章 “十七势”…………… ( 52)  
第五章 王昌龄的绝句…………… ( 68)  
第六章 盛唐诗风:结论…………… (101)

后记

附录

- 王昌龄边塞诗时地初探…………… (105)  
王昌龄事迹新探…………… (125)  
谈王昌龄的《诗格》——一部有争议的书…………… (150)

## 第一章 王昌龄生平初探

---

王昌龄的诗歌创作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后世学者多认为他的七绝乃是中国文学的精华之一。除诗歌创作之外，他还从事诗歌艺术和理论的探讨，他的《诗格》曾为“当代才子切爱”。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有时被称为“诗家夫子”。<sup>①</sup>但他的诗篇留下来的并不多，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只不过一百八十多首，另外就是《诗格》的一些零章散句。

过去的文献材料对他的生平也缺少记载。新旧《唐书》所载甚为简略。<sup>②</sup>幸亏王氏的诗可以提供研讨的资料，此外就是他的诗友们的篇章，使我们从中可以获得线索，来具体印证当时的一些重要朝廷活动和政策，并使我们多少可以为诗人的生平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学者们过去一般接受王氏生年为公元698年，但也有不同的说法。<sup>③</sup>他早期行踪不很清楚。他的诗作反映他早期曾在高山学道读书，这可能与嵩山在东都洛阳附近有关。公元722年（开元十年），王氏二十四岁，离嵩山北上太行入山西。此行当与唐玄宗的太原之行有关。王氏有诗目证此行：

晋水千庐合，汾桥万国从。开唐天业盛，入沛圣恩浓。下辇回三象，题碑任六龙。睿明悬日月，千岁此时逢。（《驾幸河东》）<sup>①</sup>

有些学者认为此诗作于732年（开元二十年）玄宗第二次到太原时。<sup>②</sup>但从玄宗题碑一事而言，此诗作于723年（开元十一年）无误。<sup>③</sup>事见上诗第六句。

王氏在太原可能住到723年（开元十一年）的春天。在那年过了寒食节，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晋阳寒食地，风俗旧来传。雨灭龙蛇火，春生鸿雁天。注多流水涨，歌发舞云旋。西见之推庙，空为人所怜。（《寒食即事》）<sup>④</sup>

从太原，王氏还有可能北上到长城附近，他的诗集中有几首提及代北和雁门的诗，时间可能是同年秋天。

从722年秋天他北上太行入晋，到次年秋天，王氏整整在山西住了一年。此行的目的还不很清楚。但从《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这首诗来看，他的离嵩北上似乎是为了功名。<sup>⑤</sup>这也说明他此行与玄宗的行止同时。他到雁北的目的也不至超出这个范围。至于他并未达到此行的目的，倒有下面这首诗可以为证：

秋雾连云白，归心浦溆悬。津人空守缆，村馆复临川。篷隔苍苍雨，波连演漾田。孤舟未得济，入梦在何年。（《沙苑南渡头》）<sup>⑥</sup>

诗中欠明确的时日,但既然是秋天,同时沙苑又处于太原到长安路上,因此我认为当作于723年之秋。诗的最后两句说明他这时功名未遂。

王氏在长安住的时间并不过久,因为我们发现他可能于723到725年间(开元十一年至十三年)到过西北边塞。有些诗,包括一些很出名的边塞诗章,提到临洮、玉门关、青海、楼兰、碎叶等地,并将他的活动主要放在长城以西和今新疆东境一带。他的《望临洮》:“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说明他顺官道而行。他的《从军行》说明他可能在724年秋冬在玉门关一带活动。<sup>⑩</sup>

最迟在725年秋他已顺着官道北路返长安:

白草原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穷秋旷野行人  
绝,马首东来知是谁。《旅望》<sup>⑪</sup>

白草原位于黄河以南,在今宁夏固原北。王氏遂由此白草原经萧关入塞: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  
草。《塞下曲》<sup>⑫</sup>

过萧关,王氏进入泾州,从泾州南下便接官道。《山行入泾州》记载此行:

倦此山路长,停驂问宾御。林峦信回惑,白日落何  
处。徙倚望长风,滔滔引归虑。微雨随云收,濛濛傍

山去。西临有边邑，北走尽亭戍。泾水横白烟，州城隐寒树。所嗟异风俗，已自少情趣。岂伊怀土多，触目忻所遇。（《山行入泾州》）<sup>11</sup>

王氏旅途的下一站便是离长安不远的扶风，他的《代扶风主人答》长诗记载了他与居停主人谈话的一些内容：

杀气凝不流，风悲日彩寒。浮埃起四远，游子弥不欢。依然宿扶风，沽酒聊自宽。寸心亦未理，长铗谁能弹。主人就我饮，对我还慨叹。便泣数行泪，因歌行路难。十五役边地，三回讨楼兰。连年不解甲，积日无所餐。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乾。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乡亲悉零落，冢墓亦摧残。仰攀青松枝，恻绝伤心肝。禽兽悲不去，路傍谁忍看。幸逢休明代，寰宇静波澜。老马思伏枥，长鸣力已殫。少年与运会，何事发悲端。天子初封禅，贤良刷羽翰。三边悉如此，否泰亦须观。（《代扶风主人答》）<sup>12</sup>

王氏西北之行的目的，大约相同于同时代不少有抱负的文人，旨在进入军幕，投笔从戎，以谋仕进之路。但他的这一次举动从时机上来说是不巧的。因为，722年（开元十年）突厥向唐朝廷求和，东胡也为唐军所败，首领被擒；与此同时，吐蕃的军事攻势也受挫。此后五年内唐帝国的东北、北方和西北边境进入平静状态。<sup>13</sup>这可以说明为何扶风主人说“三边皆无事”，以及他为什么要劝王昌龄去从事于翰墨。

在这之后，王昌龄遂于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春登进士

第，与他一起登第的还有后来也以诗才著称的他的好友常建。<sup>⑭</sup>《旧唐书·王昌龄传》说他进士登第后即授为秘书省校书郎。这是正九品上的低级官员，但却有清雅的名声。诗人孟浩然于728年(开元十六年)由襄阳入京，曾与王昌龄交游。过了两年，孟浩然离长安，在出潼关时，还写了一首怀念王昌龄的诗：《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sup>⑮</sup>

公元734年(开元二二年)，王昌龄又应博学宏词试，并且登第，就由校书郎改为汜水尉。就在做了几年汜水尉之后，发生了贬谪岭南的事。

王氏此次被贬谪的原因不明。据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所称，他的两次被贬都是因为“不获细行”。<sup>⑯</sup>王氏自称则说是“本性易然诺，得罪由己招”，<sup>⑰</sup>但也没有细谈。被贬时间当在任汜水尉之后，很可能是在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他的两首诗《留别伊阙张少府郭大都尉》和《次汝中寄河南陈赞府》，<sup>⑱</sup>说明他可能从洛阳首途向西南方向上路。也许是因为他的罪情并不是过分严重，他可以在“衡湘暂沿越”，可以带着母亲在路上访朋探友。

在江陵一带，王氏可能住过数年之久。张九龄于737年(开元二十五年)外放荆州长史，<sup>⑲</sup>同年孟浩然从襄阳南下入张九龄幕。这几个老朋友在一起时有过从。在这一段时间里，王氏很可能暂栖于江陵附近的山林。常建有一首《宿王昌龄隐居》，讲的可能就是这个住处：

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宿王昌龄隐居》)<sup>⑳</sup>

诗中所说的西山大约就在长江边和江陵附近。

在738年(开元二十六年)秋天,王昌龄不得不离开他的朋友而继续南行到岭南贬地。<sup>⑤</sup>我们无法知道当权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可能的一个理由是张九龄本身受到更强烈的政治压力,因而无法再继续庇护王氏。这可从王昌龄的《奉赠张荆州》一首诗里得出一点消息:

祝融之峰紫云衔,翠如何其雪嵒岩。邑西有路缘石壁,我欲从之以穿嵌。鱼有心兮脱网罟,江无人兮鸣枫杉。王君飞鸟仍未去,苏耽宅中意遥缅。(《奉赠张荆州》)<sup>⑥</sup>

诗中最后第二句的“王君”指的是王乔。汉帝听闻王乔骑双鹤事设法困之,但所得仅为前所赐之一履。<sup>⑦</sup>最末一句的苏耽是湘南人,曾配药救助乡里,事隔多年,一日,一白鹤飞翔故里上空,乡人无知,引箭射之,不中,白鹤乃于一板上大书“闾里如昔,人物已非”,<sup>⑧</sup>从这里可以意识到诗人是想逃避恶劣的现实政治,也在劝张九龄退出政局。张九龄也终于在739年(开元二十七年)春即辞职回乡,并于次年去世。<sup>⑨</sup>

王昌龄此时已受到政治方面的某些攻击,这可以从常建的一首诗中看出:

刘芦旷野中,沙土飞黄云。天晦无精光,茫茫悲远君。楚山隔湘水,湖畔落日曛。春雁又北飞,音书固难闻。谪居未为欢,谗枉何由分。午日逐蛟龙,宜为吊冤文。翻覆古共然,名宦安足云。贫士任枯槁,捕鱼清江

渍。有时荷锄犁，旷野自耕耘。不然春山隐，溪涧花氤氲。山鹿自有场，贤达亦顾群。二贤归去来，世上徒纷纷。《鄂渚招王昌龄张僖》<sup>⑧</sup>

孟浩然的送别诗，也提供同样线索：

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缟纈，乡味有槎头。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忧。数年同笔砚，兹夕间衾裯。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送王昌龄之岭南》<sup>⑨</sup>

谁是魑魅呢？他们是不是李林甫的爪牙呢？

在离开“数年同笔砚”的孟浩然后，王昌龄即首途岭南。他的目的地是处于今湖南南部的桂阳，到达时当是同年秋天。他此时感到前途无望，只能以“闭门观玄化，携手遗损益”自解。<sup>⑩</sup>可是王氏在桂阳之居并不很久。公元739年(开元二十七年)玄宗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开元已来诸色痕痕人咸从洗涤。”<sup>⑪</sup>王昌龄可能因这次的赦令而得以北返。

王昌龄于740年(开元二十八年)春离桂阳，经衡阳、岳阳等地北上，于同年秋到达襄阳与孟浩然作别。此事见孟浩然的《送王大校书》：

导漾自番禺，东流为汉川。维桑君有意，解缆我开筵。云雨从兹别，林端意渺然。尺书能不吝，时望鲤鱼传。《送王大校书》<sup>⑫</sup>